

International
Joint
Study
on
Sino-Japan
War

杨天石
傅高义
主 编

中日战争 国际共同研究

第三卷
国际关系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International
Joint
Study
on
Sino-Japan
War

杨天石

傅高义

主 编

中日战争

国际共同研究

第三卷

国际关系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全3卷/杨天石,傅高义主编.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9
ISBN 978-7-5097-7845-6

I. ①中… II. ①杨… ②傅… III. ①抗日战争—中国—
文集 IV. ①K265.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70559号

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全3卷)

主 编 / 杨天石 傅高义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宋荣欣

责任编辑 / 梁艳玲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近代史编辑室(010)59367256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90

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82.5 字 数:1297千字

版 次 / 2015年9月第1版 2015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7845-6

定 价 / 399.00元(全3卷)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有限的伙伴关系：1928～1944 年中国与德国、苏联和	
美国的关系	柯伟林 / 0767
抗战期间的外国军事援助与中外合作	章百家 / 0796
中日战争与日德中苏关系	田岛信雄 / 0827
中日战争时期的苏联、美国和国共统一战线	Н. Л. 玛玛耶娃 / 0845
围绕经由云南省的援华路线展开的国际关系问题	
——以日本方面的应对为中心	石岛纪之 / 0860
抗战前夕的中日国交谈判	臧运祜 / 0873
抗战时期重庆大轰炸的国际影响	潘 询 / 0898
重庆政治空间的东北因素	
——“收复东北”话语在国内外格局中的号召力	
.....	西村成雄 / 0910
中美特殊关系与美国关于战后国际格局的构想	陶文钊 / 0929
重塑中国形状：二战期间美国战略思维与中国	
少数民族边疆	刘晓原 / 0949
华侨还是革命之母？	
——论抗战早期的国民党和华侨动员（1937～1941）	
.....	费利文 / 0967

珍珠港事件前美国企业在华北的投资活动 ——以大来和英美烟公司为例 (1939 ~ 1941)	吴翎君 / 0986
陈光甫、孔祥熙与中美经济关系的失败 (1941 ~ 1944) ——以大来和英美烟公司为例 (1939 ~ 1941)	格瑞·刘易斯 / 1008
中美英平准基金会的运作与中国战时外汇管理	杨雨青 / 1023
美国与中国战时生产局 ——以中方档案文献为重点的考察	王 勇 / 1048
抗战时期的蒋介石与斯大林	李玉贞 / 1077
抗战期间中共与共产国际关系的演变	杨奎松 / 1097
蒋介石与尼赫鲁	杨天石 / 1121
战时中加关系	戴安娜·拉瑞 / 1147
抗战胜利前后中法对于越南问题之交涉 (1945 ~ 1946)	杨维真 / 1166
法国远东结盟论 (1931 ~ 1940)	巴斯蒂 / 1194
二战期间的中国海关：一个倔强的畸形儿	方德万 / 1226
中日战争期间英国的外交及对中国政府 态度的演变	米 德 / 1250
中日战争时期中国的对美“国民外交”	土田哲夫 / 1264
再版后记	杨天石 / 1286

有限的伙伴关系：1928 ~ 1944 年 中国与德国、苏联和美国的关系

柯伟林 (William C. Kirby)*

导 言

自 1928 年国民党统治开始，中国第一次进入了其现代意义上的国际合作关系时期，寻求国际伙伴关系首次成为中国内政与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中国从一个任由列强以牺牲其利益作为它们谋求彼此合作的筹码而并未实际参与世界政治结盟的时期，进入一个与世界最强四国之中的三国形成重要经济或战略结盟的时期，中国当时在军事和经济上尚处于贫弱地位，所有这些联盟关系没有一种被证明是持久的。每种关系对中国所追求目标的实现都很重要，所提供的经验教训也值得今天思考和借鉴。总的来说，所有这些关系都表明中国旨在通过短期内多样化的合作关系来谋求其始终如一的外交目标。

中国的外交政策尽管受历史经验和政治原则的影响，但并非完全由其决定，在实际执行中非常灵活。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与其潜在合作伙伴的需求也在不断变化，这使得特定时期下的中外友好关系没有单一的形式。在双方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国民党政府开始了现代中国与德国

* 作者单位：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

的第一次合作关系。这种以经济、军事和意识形态因素为基础的关系在很多方面是该时期最成功的，但在某种程度上缺少共同的战略关注。现代中国首先是与苏联，而后是与美国结成具有真正国际意义的联盟关系，共同战略利益是主要的决定性因素。在二战前及二战期间云谲波诡的多极国际环境中，国民党政府与所有强国的关系（本文对有些国家不做重点讨论，比如英国和日本），证明了它是一个纵横捭阖的国际政治玩家。

一 国民党的遗产及政策目标

中国国民党统治时期与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在主要外交目标方面，有几点是相似的。两者都认为中国在19世纪的大多时间是处于列强统治之下的民族“屈辱时期”，政府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重新恢复和维护中国的国家主权。在坚持这一原则的同时，两者也都在中国工业化发展过程中谋求大规模的外国援助，正如后来邓小平所言，“政治与经济上的独立是密不可分的”。^① 两者都曾在一定程度上尝试了极有可能促进中国自主发展的、新形式的外国经济和政治模式。然而，不同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国民党政府并未立即面临一个极其严峻的战略威胁，也没有一个自革命年代就持续存在的战略盟友。相反，它继承了以前中国政府和国民党自身的经验和教训。教训表明，一项外交政策首先是建立在一系列的双边独立关系基础之上的。

贯穿19世纪中期至国民党统治初期，中国政府在对外交往中一直奉行的是具有古老“朝贡”特点的中外交往制度。这一制度严重制约了中国外交政策在双边关系中的灵活性。中国在被迫与这些列强（主要是西方国家及后来的日本）打交道时，更多的是把它们看作一个整体，而非个体。由于列强在中国的特权和相互间的猜忌，迫使它们采取了一个早期的“共同防御”形式以维护各自在华的权益。在这种外交格局下，用传

^① 1974年4月在联合国的演讲，转引自Michael Yahuda, "Contemporary Chinese Concepts of Self-reliance, Independence, and Alignment," p. 33, 1987年8月在冬青召开的中国现代外交关系合作形式会议上提交的论文。

统策略制约侵略者是不太可能获得成效的。1896年李鸿章试图寻求与俄国结盟来抗衡日本旨在“以毒攻毒，借力打力”策略的失败，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因而，在国民党统治之前，中国从来没有一个欧洲意义上的“盟友”。在帝制时期，中国充其量不过是一个自封的“天朝上国”。在这种情况下，列强逐渐把它们自身看成一个群体，这也正是美国长期以来关于美中“特殊关系”的看法。在19世纪晚期的自强时代，清政府一直在寻求一种与英、俄合作和保护的底护—附庸关系，尽管这种关系没有维持多久。然而，清政府和早期的中华民国都未参与1866~1917年形成的战略同盟国际体系中（1902年日本加入）。1917年，中国试图通过一战中参加同盟国一方作战加入该体系，然而在凡尔赛和会上当中国的要求被忽略之时，这一迟来的、未尽全力的努力实际上也被断然否决。1920年代，当全球联盟体系被更加不稳定的国际政治格局所取代时，中国却无力趁机去利用这种局势。1921年华盛顿会议的决议清楚地表明：除了革命的俄国和战败的德国，西方列强谁也不会平等互惠的基础上单独与中国发展新型关系。^①

和中外政治关系一样，在中外经济关系中，中国的活动自由也受到类似的制约。除了所谓的不平等条约强加给中国经济主权的限制外，在国民党统治之前的时期，中外经济合作关系一贯被认为是次等合作伙伴关系。铁路联合企业就是其中一个明显的例子，如中东铁路，中方负责人在俄国的经营管理中只不过是一个傀儡。中外煤矿和中外合资银行也一概排斥中方担任任何管理者的角色。而且，正如在政治领域一样，在经济领域，列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仍试图持久地维持针对中国的统一阵线。列强之间的合作优先于与中国的合作，这一点在1920年英、法、美、日四国银行国际财团形成的时候就已被证明。这个财团坚持对中国市场的“门户开放”政策，特别是不对任何一国开放太多。在其存在的17年间，它甚至

^① 因为大部分条约都包含着无条件最惠国条款，它们之间的合作导致“把它们对中国的共同政策降低到最保守或在它们中间的水平”。见 R. Pollard,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to 1931* (New York, 1933), p. 404. 修正主义者关于中国在一战中以及国内政治形势方面的观点，参见 Guoqi Xu, *China and the Great War: China's Pursuit of a New National Identity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没有批准过一项针对单独一国的贷款。^① 对早期的国民党政府而言, 中国近代历史的一个显著教训就是要和外国列强单独打交道, 而不是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来应对。这一点并不让人吃惊。在 1928 ~ 1931 年间比较成功的 (相对以前的成果) 条约修订运动中, 这是其中的一个主要因素。到 1930 年代早期, 中国通过谈判恢复了对海关、关税、邮政通信、盐业垄断收入和在华近 2/3 租界的控制权。^② 在政治关系中, 随着俄国和德国在 1920 年代从强国行列中退出, 以及 1930 年代其他列强与日本之间关系日趋恶化, 一项基于双边谈判结盟的外交政策成为可能。在追求经济援助和投资的过程中, 国民党政府还特别强调双边关系, 并试图借此促进各国之间寻求对“新中国”市场份额的竞争。为此, 政府还在 1928 ~ 1930 年间, 派遣了许多批次的官员分别前往欧洲国家和美国考察。

可以肯定的是, 在南京国民政府执政期间, 中国在国际联盟的“全球伙伴关系”中是一个积极的参与者。^③ 但是, 除了在 1930 年代中期从国联得到一定程度上有用的技术援助外, 在外交和安全事务中, 中国与这个国际团体不愉快的经历只是加强了它对通过其他途径来维护自身利益的渴望。

国民党统治的早期与很多国家建立双边关系的策略并不是没有风险。对于一个没有“天然盟友”的军事弱国而言, 在政治自治和危险的孤立之间有着一一条细微难察的界线。条约修订期间, 中国可能已经表现出其在外交上的独立性, 但同时也暴露出它在危急时刻没有可以依赖的坚定盟友。在 1929 年和 1931 年, 中国分别与两个最强大的邻国发生了冲突。1929 年, 中国与苏联就中东铁路问题爆发了一场短暂而激烈的武装冲突;

① William C. Kirby, "Joint Ventures, Technology Transfer and Technocratic Organization in Nationalist China, 1928 - 49," *Republican China* 12, No. 2 (April 1987), pp. 4, 7.

② R. Pollard,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to 1931* (New York, 1933), pp. 330 - 399; Mark Mancall, *China at the Center: 300 Years of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1984), pp. 213 - 214.

③ 参见 Robert Keohane, "Partnerships and Alignments: Neorealist and Institutionalist Analyses," p. 6, 1987 年 8 月在冬青召开的中国现代外交关系合作形式会议上提交的论文。关于中国与国际联盟的合作, 参见 William C. Kirby, "Engineering China: Birth of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1928 - 1937," in Wen-hsin Yeh ed., *Becoming Chines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pp. 137 - 160.

两年后，中国又面临着日军对东北的肆意侵略。在这两起事件中，中国发现自身濒于孤立，缺乏有效的外交支持而且没有足够的军事力量独立去抵抗这些邻居。

与日本的冲突迅速激化了。日本自世纪之交就开始对域外特权的谋求在1931年变成了对中国1/5领土的侵占，中华民族也为了生存进行斗争。1931年后，对日斗争在中国外交政策中占据主导地位，也使得中国开始了一系列的合作伙伴关系，这是其在条约修订时期不曾预料到的。

没有一个术语可以描述随后1930年代和1940年代早期的中德、中俄和中美关系，它们在范围、期限和亲密程度方面都有所不同。在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甚至那时也没有一个明确解释双方相互责任的中美结盟协议），中国没有一个正式意义上的“盟友”。三个伙伴中关系最密切的德国，也即将在该阶段末期与日本结盟。这一阶段中国从其外交关系中所谋求的甚至可以描述为一种新形式的“赞助”：以合作和援助来帮助中国维持统治。这一形式采取提供军事工业能力和道义政治指导的形式（德国），或更直接的军事、财政和战略援助的形式（苏联和美国）。这在国民党历史上已有一些先例：早在1920年代初期孙中山就谋求德国和苏俄的援助。在他看来，国民党只寻求与那些能提供中国所需物资和建议却不会进一步损害中国主权的国家合作。^①

这不是一项简单的任务，后来的政策制定者从孙中山那里和国民党在1924~1927年接受苏联援助的经历中得到的教训之一就是必须力避对任何一个国家的依赖。尤其是1937年之后，尽管中国一再希望有外国能对日本进行强势干预来帮助解决中国的外部问题，但是来自任何方面足以威慑日本的外援都极有可能意味着巨大的政治代价。不管怎样，中国对物资和安全所需的范围之广和种类之多，不是单独一个国家可以提供得了的。与此同时，希望尽早建立一个多国的反日统一阵线，很明显也是不现实的。

^① 参见 C. Martin Wilbur, *Sun Yat-Sen: Frustrated Patriot* (New York, 1976)。关于“特殊关系”问题，参见 Michael H. Hunt 的现代经典研究 *The Making of a Special Relationship: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to 1914* (New York, 1983)。

因此, 1931年后, 中国在对外交往中奉行多样化的合作关系。这可以分为两个阶段。随着正式的共同防御会议(国际联盟)阻止日本侵略失败后, 国际联盟在1932~1937年的策略旨在提高中国独立抗击日本的能力。在国内, 这意味着开展军事和意识形态运动以实现中国最高领导人蒋介石所说的“攘外必先安内”。在经济领域, 这意味着首先在国家领导下, 在被称作国防经济的范围内, 通过加快重工业和通讯业发展的进口替代政策, 为打一场现代战争而建立必需的军事工业生产能力。在经济和安全事务方面的外交政策, 则采取可以给中国带来利益却不致丧失自主权的有限“优惠伙伴关系”。^① 这一时期的中德关系密切, 中英、中美合作关系不算太成功, 中苏安全关系则刚刚开始。

第二个阶段始于1937年。在中国尚未完成国防准备之前, 日本发动了对华全面战争。继对国际联盟和世界舆论的徒劳呼吁再次失败后, 中国被迫首次谋求和任何一个愿意对日作战的国家(国家集团)结成军事联盟。这一愿望直到1941年才得以实现。尽管外国干预对中国外交政策是一个巨大的危险, 但这一时期显示了重大外交回旋的自由, 鉴于中国薄弱的军事力量, 这个时期所取得的成功也是很巨大的。中国获得了各种不同形式的援助, 它们来自苏联、美国、英国和援助量正在降低却仍有帮助的德国。彼时, 德国正在苏联、英国-美国和新兴的轴心国/三方集团的全球三角政治关系中纵横捭阖。1938~1940年, 苏联继德国之后成为中国经济和军事的主要援助国, 而苏联又在1940~1941年被美国所代替。尽管珍珠港事件不可避免地使中国获得了一个承诺对日作战的盟友, 并至少在战略上使得中国进入了所谓的民主阵营, 但这也标志着中国在全球政治中自由外交政策时期的终结, 并最终使中国对对其最慷慨的, 在某些方面却最具破坏性的合作伙伴的依赖达到了难以摆脱的不健康程度。

随着官方和主要参与者私人文件的解密, 1928~1944年中国外交的全貌仍然有待于进一步梳理, 因而对这个阶段的很多研究都集中在战争和冲突方面是可以理解的。本文将探讨中外关系的合作形式, 并比较中德、中苏和中美关系的经历。尽管这些关系在众多方面相互影响, 但它们在在各

^① Robert Keohane, *Partnerships and Alignments: Neorealist and Institutional Analyses*, p. 6.

自的鼎盛时期却没有相互交错，并且每种关系都具有鲜明的特性。本文接下来将扼要描述它们各自的历史，并把注意力放在合作的基础、制度化的程度和形式、文化和意识形态因素以及政治领导层的作用等方面，对每一种情况都将以对经济合作（合资企业）具体例子的探究作为揭示较大合作关系的方法。最后，本文将从中国外交目标的角度去评估这些相对成功的合作关系。

二 中德关系^①

在国民党政府所涉及的三大主要合作关系中，与德国的关系是最亲密的，并且是令双方最满意的。同时，这一关系也是非常独特的。因为它基于的不是全球性或地域性权力政治的共同利益，而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缺乏对共同战略的关注。每个国家的安全考虑主要是区域性的，这意味着两国彼此没有共同的利益冲突威胁。事实上，一战后德国在中国没有治外法权，这也保证了中德双方基于自身情况令双方满意与否来发展彼此的经济、军事和文化关系。与此同时，双方最高政治阶层缺少协调，使得这种关系具有内在的不安全性：没有一个国家的存在是必不可少的，任何战略利益冲突的出现都可能使中德之间的友好关系缓和或终止。

1928~1938年，特别是1933~1937年，蒋介石政权和德国关系的密

① 关于这个时期中德关系的二手文献包括：William C. Kirby, *Germany and Republican China* (Stanford, 1984); Hsi-Huey Liang, *The Sino-German Connection: 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 Between China and Germany, 1900 - 1941* (The Hague, 1978); John P. Fox, *Germany and the Far Eastern Crisis* (New York, 1982); 《德国驻华顾问团工作纪要》，台北，1969; Françoise Kreissler, *L'Action culturelle allemande en Chine* (Paris, 1989); 张启运主编《中德文化论集》，台北，1966; 程天放：《使德回忆录》，台北，正中书局，1967; 蒋恭晨：《中德外交史》，上海，1929; Bernd Martin ed., *Die Deutsche Beraterschaft in China, 1927 - 1938* (Düsseldorf, 1981); Kuo Heng-yu ed., *Von der Kolonialpolitik zur Kooperation* (München, 1986); Hu Chang-tze, *Deutsche Ideologie und Politische Kultur Chinas* (Bochum, 1983); Mechthild Leutner ed., *Deutschland und China, 1937 - 1949: Politik, Militär, Wirtschaft, Kultur: eine Quellensammlung* (Berlin: Akademie, 1998); 马振犊、戚如高：《蒋介石与希特勒：民国时期的中德关系》，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8。

切程度超过了其他国家。德国军事顾问团重组了国民党的军队，顾问团的主要领导人担任了蒋的私人政治和经济顾问。1930年代中期，中德贸易、信贷和技术援助协定为德国国有化工业奠定了基础。同时，德国工业界开展了一项创新计划用以资助中国教育培养专业技术人才。他们从德国留学归来后，越来越多地任职于主管中国工业和军事现代化的机构。德国所有的这些支持都是源自于双方在意识形态层面上的相似性，在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一些具体方面，德国已经成为中国效仿的榜样。

作为“修正主义”国家，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中国和德国只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世界政治格局中具有相同的政治目标。众所周知，两国都置身于国际体系之外并遭受“不平等”条约限制的境况，促使双方创造了中外合作的崭新形式，并给发展这一关系的双方领导人提供了重要的心理契合。尽管双方在军事互惠关系上日益密切，但没有针对任何一方的在明确的政治或战略目标上的具体合作。更确切地说，在其他领域进行合作的政治基础建立于一战时德国在东亚军事和政治的撤出以及1920年代，它以一个“非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仅有经济利益的面目重新出现。这些经济利益在1920年代初几近为零，1936年上升至顶点，可以说德国在中国军事和工业发展中具有一定的“势力范围”。在没有其他国家愿意这样做的情况下，德国按照中国的条件做生意，反过来又进一步促进了其在华的经济利益。

由于在中德关系中缺乏实质性的政治考虑，使得双方外交部门的工作趋于例行公事，并日益远离于其他官方层次的军事和经济合作。这也使得双方合作的信任水平与机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稳步增长，而且不受外交冲突的影响。

国民党政府中的德国军事顾问团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个顾问团可以追溯到孙中山早期（在苏俄之前）对德国顾问的寻求。顾问团是在1928年一群退伍的德国官员与中国政府达成私人协议的基础上组成的。尽管在其前5年里军事培训工作进展缓慢，但这个顾问团从一开始就是中德军事和经济领导人在广泛领域内合作的一个具体标志和基础。它成为国民党政府军队中的一个常设机构，也是1930年后德国陆军部的一个半官方机构。1933年，当中德寻求扩展军事、经济合作领域时，德方首

席代表汉斯·冯克特上校通过顾问团被邀请到中国。在顾问团工作的整个历史中，它最终为国民党培训了8万名新式中央陆军精英，并且很少有个人和政治摩擦（而这伴随稍后美国人的顾问工作）。尽管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顾问团团长马克斯·鲍尔（1928～1929）将军、西克特（1934～1935）和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1935～1938）的个人品质，但他们都与蒋介石有着良好的工作关系，当顾问团的工作不涉及被顾问国家自身的军事战略事务时，无疑使双方更容易热忱相待。这同样适用于1940年代的美国顾问团。1932～1933年，当顾问团团长乔治·魏采尔将军的非外交言辞和政治谋划危及德国使命时，他迫于来自柏林和南京的压力而离职。^①他和后来的美国将军约瑟夫·史迪威在这方面具有相似之处。

在经济领域也如军事领域一样，部分大规模合作的基础设施建设在1933年得到落实。1920年代晚期，德国工业界关于对华新投资的提议比西方其他国家表现出了更大的兴趣。作为一家合资民用航空公司的中德欧亚公司是该时期唯一出现在中国的主要合作项目。然而，自1929年开始，德国工业和通讯公司的主要代表德意志帝国工商协会，开始就中国市场实施全面工业战略，并对尚处于萌芽状态的国有工业部门给予特别关注。这个战略不仅包括派遣一个主要的研究委员会（1930年）和为促进中德合作而建立一个常设的国家工业机构（中德交流协会，1931年），而且还在广泛的基础上，发展有充足资金支持的经济、技术和文化关系。正如人们所认为的那样，这种文化宣传特别是对中德教育机构培训中国工程师方面大有裨益，而且还在中国催生了许多新的中德组织和德国文化机构。比如，尽管这种文化活动不能在范围上与在华出现的美国文化活动相提并论，但它的目标相当具体：现在与将来“在（中国）的企业、政府以及其他方面处于领先地位的人才是那些受过德式教育，并由此产生寻求与德国发展更加密切合作关系倾向的人”。^②这种努力使两国经济和军事领导

① 关于魏采尔，参见 J. B. Seps 的文稿，in Bernd Martin ed., *Die deutsche Beraterschaft in China, 1927-1938* (Düsseldorf, 1981)。

② 本段及以下几段，见 William C. Kirby, *Germany and Republican China*, Stanford, 1984, pp. 68, 102-109, Chapters 2, 4, 5, pp. 218-220, 190。

人之间的合作得到了各自国民的支持。

基于早期的努力,1930年代中期双方的军事工业合作范围大大地扩展了。简单地讲,在“国防经济”纲领的指导下,一个中国工业发展战略的新构想也正符合了德国1933年后在华的新经济利益。双方战时的经济利益日渐趋于互补。

希特勒上台后加速重整德国军备力量,因国内尚无法全部消费本国的军工产品,从而增加了对外出口市场的需求。在秘密重整军备的魏玛共和国时期,苏联曾是德国投资和贸易的一个重要国家。当德国新的领导层对此加以限制后,中国成了德国军队、德意志帝国工商协会和内松·沙赫特领导下的经济部在外贸政策调整方面的主要替代者。德国重整军备对中国国内的战略原料,特别是钨、锑的需求也大幅增加。德国本国内没有这些原料,而中国的产量在世界市场上占有主导地位。所有这些新的需求,使德国在制定外贸政策时侧重于促进、支持和保证在华的工业投资,而且已经达到了一个以前难以想象的水平。

从中国的角度看,就德国所提供的物资和技术类型而言,德国在华工业的新推动与国民党政府在1932年后的渴求极为一致:把重点放在与军事相关的重工业和通讯业发展上,为即将到来的对日战争做准备。中德工业合作最初是在国防计划委员会,后改称为国家资源委员会的政府机构协调下进行的,这并非意外之事。这个机构规划和管理着日益发展壮大的国有工业领域中最大的一部分。国民党政府趋于中央集权方式的经济计划不是中德合作的障碍,却会阻碍二战时期和战后中美之间的工业计划。中国想要建立一个国有重工业部门作为走向统制经济的第一步,并根据国家计划由其组织和分配新的外国工业投资。对那些一战后在中德贸易复苏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的德国私营进出口贸易公司来说,这不是一个好消息。它们的利益被两国具有影响力的人物在国家层面需求的协调中压制了。德国政府只有一个国有企业协调在华德国工业利益。这个国有企业极大地促进了与南京政府的合作,协助中国创建了国有企业,但在其中并未拥有所有权。

在中德支持下的企业不是股权合资企业(合资经营),而是契约合资企业(合作经营),其中合作伙伴的责任和义务并不直接与其股权相关

联。(在中国和德国的)德国权益集团既为中国国有企业提供咨询、工程和技术培训服务,又提供相关建设方面的材料。贸易往来出现在各种各样的贸易协约中,这在当时是革命性的,而且避开了现有的国内和国际对华工业投资的障碍。^①

作为在华南中心地区发展国有企业经济和战略计划的一部分,中国矿产和德国工业品以及服务的易货贸易首次运用在中国重要铁路网的扩展上。这个相对安全的易货贸易机制,可以使中国分期偿还德国1934~1936年建设浙赣、湘赣铁路时的借贷、利息和技术援助费用,同时允许中方保持对铁路线路的完全控制权(这是以前中外铁路协定中从未有过的情况),并且在铁路管理中也没有外国人参与。类似的协定还资助了中国第一家重型卡车制造厂以及中国汽车制造厂的设备进口。^②

在国家资源委员会领导下开展的工业项目里,对贸易方法最大胆的利用发生在1936年,这也是中德经济合作的鼎盛时期。南京政府十年建设期间,在最重要的计划项目技术转让中,中国获得了德国最先进的工业技术,而且同时对合作企业保持了完全的国家控制权。类似的例子有,湖南湘潭的新中央钢铁厂、江西吉安开建的铁钨厂、四川彭县的中央铜厂、湖南湘潭的中央机械厂和中央机电制造厂。中国工厂成套设备的进口、厂方管理和技术人员的培训都是通过一系列围绕易货贸易/易货偿债和购买协议的资助来实现的。在这些协议中,预付的货物和服务借款以中国的原材料偿还,这些借款自动延长期限,直到达到当时贸易中的固定数字(1亿元,据1936年4月的协定)。^③

① 关于这些术语的现代定义,参见 N. T. Wang, *China's Modernization and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Lexington, Ma., 1984), pp. 76 - 80; Samuel P. S. Ho and Ralph W. Heunemann, *China's Open Door Policy: The Quest for Foreign Technology and Capital* (Vancouver, 1984), pp. 111 - 113.

② Chang Kai-ngau, *China's Struggle for Railway Development*, New York, 1943, pp. 79 - 80; William C. Kirby, *Germany and Republican China*, pp. 195 - 200; 陈真主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3辑,三联书店,1961,第1102~1103页。

③ 《重工业建设计划说明书(1936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28(5965);程麟荪:《论抗日战争前资源委员会的重工业建设计划》,《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2期;William C. Kirby, *Germany and Republican China*, pp. 306 - 317.

随着德国帮助中国更新武器装备以及在中国军械部中顾问角色的加强，中德经济贸易合作延伸至一个更纯粹的军事领域。到1936年为止，这个部门的最高管理层中大部分人员曾受训于德国。在直接的军事装备购买方面，中国尤其成为德国的主要客户，至1937年，中国占德国武器和军火出口交易的37%。德国重整军备计划实际上也从中国的工业设备、武器装备的订购以及对德国钨出口的几近垄断中受益匪浅（1937年达到72%）。^①

至1936年底，中国已成为德国在欧洲以外的第三大出口市场，仅次于美国和巴西。在这一年的上半年，德国对中国的出口值超过了英国和日本，似乎超过美国也只是时间问题，德国仅比美国落后一个百分点，否则即可取代美国的领先地位。

与一个没有威胁的西方国家高度合作，对中国的政治或经济主权没有明显威胁；相反，中德合作还被调整至国民党政权最关心的领域预示着其政体的有效力得到进一步加强。除了这些现实的考虑，意识形态因素也在其中起到了刺激作用。前面已经提到两国在国际政治格局中“局外者”的感觉，而这正使某些中国领导人很希望看到两国之间的“命运相连”。^②从中国角度来看，与外国合作的可能性中更重要的是伦理标准的发展——如同蒋介石和其他国民党领导人所理解的那样——要与他们的相一致。比如，马克斯·鲍尔呼吁蒋介石在人民共同体基础上建立一个反资本主义政权，就很符合蒋自己的政治观点和经验。对于对社会持保守态度的领导者来说，他们视军事和工业发展为国家力量的关键。德国在19世纪后30多年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 and 世界强国的出现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惊人的恢复能力，可以被看作一个迅速的、非革命的国家发展的榜样。

这里没有一个特定的德国发展模式可适用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尽管军事工业的启动确实是仿照德国国防工业的概念而来的，但与之相伴随的

① 本段及下段，见 William C. Kirby, *Germany and Republican China* (Stanford, 1984), pp. 68, 102–109, 218–220, 190.

② 参见 Max Ilgner, *Bericht über eine Reise nach Ostasien, 1934–35* (私人发行, 1936), II, p. 13, 一份来自首席执行官 I. G. Farben 最详尽的报告。